

ZHAOHAIKUAN

LUNWEN XUANJI

赵海宽
论文选集



中国金融出版社

赵海宽论文选集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小平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海宽论文选集/赵海宽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8

ISBN 7 - 5049 - 3145 - 4

I. 赵… II. 赵… III. 金融—文集 IV. F8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5502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发行部：66024766 读者服务部：66070833 82672183

<http://www.chinafph.com>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刷有限公司

尺寸 148 毫米 × 210 毫米

印张 15.625

插页 4

字数 408 千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90

定价 28.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在步入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场。



作者和老伴。



作者在国际金融理论研讨会上发言。



作者在做学术报告。



作者在公园做健身活动。

MAH53/06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周年校庆典礼上作者同所带部分博士生合影。



1985年，作者协助会长乔培新（右第一人）主持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会，右第二人为作者。



1972年冬天，作者在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商务处后院赏雪。



1951年，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练习太极剑（左前第一人为作者）。

序 言

这是我 1991 年以来的论文选集。几十年来我总共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其中 1991 年上半年前发表的已精选了 52 篇，汇集为《金融理论与实践》一书，于 1992 年 10 月出版。现在这个选集，是从我 1991 年下半年以来发表的大量论文、学术报告稿、讲课提纲等之中筛选出 66 篇具有一定学术或现实价值的文稿汇集而成的。具体来说，在这个文集中共包括论文 45 篇；学术报告稿 8 篇；讲课提纲 4 篇；答记者问 3 篇；理论会上的发言稿 2 篇；对策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4 篇。学术报告稿和讲课提纲的区别，前者是就大家比较关注的经济或金融理论问题，阐述笔者的观点或看法；后者是给听众介绍经济、金融某个方面的基础知识。理论会上的发言和对策座谈会上发言的区别，前者是在理论讨论会上就某一个理论问题讲述笔者的观点；而后者是在有关领导机构召开的政策咨询会上就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的发言。遗憾的是我在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李瑞环主席等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由于多种原因，未收入本书。

为了便于阅读，我把收入到这本《选集》里的这些文稿，又按照不同的内容，划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的金融业，包括文稿 3 篇；第二部分，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包括文稿 13 篇；第三部分，货币和货币流通，包括文稿 4 篇；第四部分，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包括文稿 14 篇；第五部分，证券和证券市场，包括文稿 12 篇；第六部分，信贷资金和信贷业务，包括文稿 7 篇；第七部分，关于不良资产问题，包括文稿 8 篇；第八部分，其它，包括教育改革、香港金融改革、虚拟资本、西部大开发等文稿 5 篇。这最后一部分本来可以不要，把相应的文稿分编在第二、第四、第五部分之中，但这正是文字最多的三个部分，为了把篇幅尽可能拉

平一些，决定把这5篇单划一部分。尽管这样，各部分的字数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部分和第二部分最长，均为7万多字；第一部分和第八部分最短，各为2万多字。

各部分的文稿均按年份排列。我的文稿几乎都是根据当时经济情况和研究问题产生的，文稿的时间顺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时的经济、金融发展和改革情况。不谦虚地说，如果把我在这时期所有的文稿收集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反映我国这一时期的经济、金融大的发展变化情况。由于篇幅限制，在这些文稿中只能选进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被抛弃，反映历史的效果自然会大大减弱，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这样的作用的。

由于这些文稿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写成的，自然就会留有历史的烙印，用现在的眼光审视，就会觉得有些观点过时了、有些提法已经陈旧。为了能如实反映当时的经济金融和理论活动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这次收入《选集》时，均未作修改，仍维持原状。

这些文稿绝大部分都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但由于多种原因，也有一小部分是未发表过的。例如《对香港金融改革的意见》一文，是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组织的相关会议上的发言，考虑到当时我的身份和香港问题的敏感性，不便在报刊上发表。现在我已不是政协委员了，趁出版《选集》的机会，把它发表出来。

有趣的是，我整理编辑这本《选集》的时间，正是“非典”在北京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即2003年4月初到6月上旬。这一时期，我的各种社会活动大部分停止，正好可以集中精力做好这一工作。“非典”高潮过去，《选集》也基本完成。“非典”加快了我对《选集》的整理和编辑。《选集》中收入的文稿虽然都是我过去写成的，但整理成书的工作量仍然是不小的。首先我把1991年以后的全部文稿收集到一起，按照是否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准进行筛选，共筛选出80篇。接着把这80篇文稿彻底阅读审查一遍，将内容相近或单薄的舍弃，再筛选出66篇。这66篇中有的我是在1998年学会使用电脑前写成的，没有在电脑里存储，必须输入我的电脑中。再接着把这66篇文稿仔细审阅一遍，删去交叉重复的内容，修改“报告整理

稿”、“记者采访稿”等的文字。最后才分类编辑成册。在这整理编辑过程中家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大儿媳孙建耘花了很大工夫，没有他们的参与，《选集》是很难出来的。

作 者

2003年6月5日

作者小传

一、出身和简历

我于1930年9月2日（古历7月10日），出生于在陕西省绥德县四十里铺赵家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个勤劳、忠厚、有思想的农民，母亲是个俭朴、善良、会持家的农村妇女。家里一直很穷，本无条件供孩子念书，我的两个哥哥小时均只念过几天“冬书”（二哥早期参加革命工作，并由组织送其读完工农速成中学），姐姐则根本没有念过书，而我却在刚满七岁时就上了小学。这固然因为家庭经济状况稍有好转，父亲想让我读点书，长大了能够有点出息，但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遇到了机会。1937年我刚满七岁，恰逢抗日战争开始，旧中国政府在本村开办新式小学，动员适龄儿童上学，不收学费，我自然就上了这所学校。上小学后，我不错的天资就显示了出来，在全校四五十个孩子中我虽是年龄较小的之一，却很快成为学习尖子，并因此成为周围一些村子的知名孩子。我在学习方面的突出表现，使父亲慢慢产生把我培养成材的思想，加上1940年家乡解放，上学不需花钱，就让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又到镇上去读高小，并支持我在1944年考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

米脂中学当时是陕甘宁边区的一所重点学校，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学制度严格，图书也相对比较多。我一贯学习刻苦用功，进入这所中学后，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天把睡觉吃饭以外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到了学习上。除了学好各门功课外还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全班五六十名同学，期中、期末综合考试，我的总分多次居于第一。在校期间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7年7月，我被从米脂中学调到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工作。这是党中央率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开创陕甘宁边区，由边区政

府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基础上，在1937年10月创办的一家银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连成一片，陕甘宁边区银行于1948年初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改称西北农民银行，我仍在这家银行的总行工作。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西北农民银行总行很快又改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1949年5月西安解放，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一名成员随军入城，被派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工作。这年的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又于1951年被组织上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学习。在人民大学，我读的是银行专业，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货币流通与信用、财政学、信贷与结算、经济活动分析、成本会计、银行会计等多门课程，阅读了大量有关货币银行理论方面的书籍，为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初步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毕业后，我又回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办事处主任、分行信贷科长等职务。1964年2月，我被调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工作，担任行长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1965年11月，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合并，我改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主要任务是帮助行长们做文字工作。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于1970年6月把我派往我国驻瑞士大使馆，以外交官的身份进行国际金融调查研究工作。在那里我连续工作四年多，到1974年8月调回国内。回国后，先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局计划处副处长、处长，1979年任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人之一。1981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1982年11月改任所长。从此，我就成为我国货币银行理论研究队伍里的正式成员之一。

二、经济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我从小喜欢学习，参加工作不久后就在老同志们的帮助和提示下，开始学习政治和经济常识。从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毕业回到工作岗位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更成了我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之后我

读的书很多，既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其中对《资本论》等书进行了反复学习，又大量阅读当时可能看到的中外各种经济、金融类书籍。在西安人民银行工作时，我是西安市图书馆的常客，到农业银行总行和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又经常到人民银行总行图书馆借书。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这种读书生活也没有中断。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参加派性活动，能够利用的时间都被我偷着用于经济理论和业务知识书籍的学习。我在国外工作的四年多时间，环境宽松，时间相对充裕，可用来阅读较多的西方经济金融论著，除学外语外，其余时间我都用到了自学西方经济、金融知识方面，从而使我的经济、金融知识面大大扩展。当时在我国驻外大使馆工作的人员，由于不能带家属，“想家”是年轻人的通病。我把工作以外的时间全部用到了学习方面，生活充实，比较安心，反过来又提高了我的学习效率。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研究所工作以后，学习经济、金融理论更成了形势所逼。有人曾经劝我说，当所长应该组织推动大家研究，自己何必下那么大的工夫研究和学习。而我几十年的体会是，当所长除要做好组织管理工作外，还必须带头学习和研究，否则是绝对不能胜任的。我在体改办和研究所初期，阅读了不少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书籍，其中有些书籍在阅读之后还写了文章。例如，1979年初读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就撰写了《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政策》一文，并于1979年7月发表于《中国金融》。在研究所工作的后期看书少了，但阅读研究生的论文多了。研究生论文给了我许多新知识、新启迪。

除了从书本上汲取知识外，我还注意了通过实际工作熟悉银行业务和增加经济、金融知识。我的工作是从做银行的最基本业务开始的，管过金库，当过文书，干过密押工作，当过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碑林区办事处主任，会点钞、会记账、会办理储蓄存取手续。我曾长期做信贷工作，当过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信贷科长多年，不但熟悉这项最基本的银行业务，而且通过这项业务活动掌握了不少工业、商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知识和情况。在农业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

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综合处和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局工作期间，有机会接触国民经济运行的全国性的、综合的、核心资料 and 情况，对我国的经济、金融情况了解增多、理解加深，视野大大放开。我在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工作期间，利用瑞士这个西方国家金融中心的优越条件，大量考察和了解了资本主义货币银行制度，对西方国家经济、金融运行情况有所了解和认识。在人民银行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的几年，我对改革的理解加深，并为以后长期研究我国的经济、金融改革打下了基础。到研究所工作后，则更多的是从宏观侧面，观察、了解我国和世界经济、金融情况。总之，我已踏入银行大门 57 年，新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发展，体制改革、业务变化，大的方面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的。

三、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

我从小喜欢思考和写作。在延安时虽然只有十七八岁，就在老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学着写作并在当时本单位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如何识别黄金》、《不要把布告贴在家里》等短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毕业回到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市分行工作后，对理论问题开始产生兴趣。在此期间，我写作并在当地报纸和银行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至今手上还保存着一些当时发表过的文稿。当然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些文稿的水平很低，是拿不出手的，但它们是我后来研究和创作的起点。同时，我还曾对分行所有信贷人员讲授《经济活动分析》；给我当主任的人民银行碑林区办事处工作人员业余学习班系统讲授货币银行学；对这个区各部门的一千多名干部进行政治经济学大报告。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后，我除了做好对西方经济、金融情况发展变化的观察和分析，尽可能为国家多掌握世界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外，还注意对驻在国金融制度进行研究。瑞士的各家大银行我都进行过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且每考察一家就向国内写一份比较详细的书面报告。对瑞士法郎更是进行了历史的、现实的反复考察、研究，向国内书面报告过多次。对这个国家银行制度整体的历史、现状、特点，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向国内写过多次报告。我还向国内翻译报送过西方报刊上对我国有用的信息或文章（在工作的后期我已能对

短小的英文专业文章进行笔译)。这批书面报告是我在国外四年多时间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当时国家还派了杨沪田同志作为我的翻译和助手,在这些报告和材料中也包含着他的劳动),对我国经济界研究西方经济、金融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原计划回国后把它们汇集成书,可惜那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作秩序混乱,无人负责,全部散失,甚为可惜!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研究风气逐渐恢复正常,我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兴趣进一步增强,不仅发表的文章增多,而且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约请,从1978年起撰写《综合信贷计划》一书,并于1979年10月出版。1981年我被调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所担任所长,随后又被选为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又担任《金融研究》的主编和《中国金融年鉴》的副主编。在这一岗位上,我除了在行长、会长领导下,组织推动全国金融系统(后主要为人民银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活动,组织和参加了大量的全国性金融学术和理论讨论会议外,在个人方面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活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从1993年起,我从研究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名誉所长至今,我的行政管理工作减轻了,而个人的理论研究活动加强了。在这期间我又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总共几十年,特别是在进入研究所工作的二十多年里,我的主要理论活动和成果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个人著作七本:《综合信贷计划》(197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货币银行概论》(198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2次印刷);《金融市场论》(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金融理论与实践》(1992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中国金融业的大变革》(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货币流通与通货膨胀》(1993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金融体制改革最新读本》(1994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由我牵头同别人合著的书近十本。例如,《银行统计与信息管埋》(1986年东北财经出版社出版);《银行体制改革》(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信用》(198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研究》(1993年中国金融出版

社出版);《经济转轨时期的宏观调控与货币政策》(1996年10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现代金融学》(我同王国乡教授共同牵头,1999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新编企业会计》(1993年5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等等。至于由别人牵头或主编而有我写的内容或文章的书则还要多些;由我参加编辑、审定或写序言的书则更多,大约有几十本,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由我主编或参加主编的大型工具书九部:《人民银行法与商业银行法诠释》(赵海宽主编,1995年9月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现代金融科学知识全书》(赵海宽主编,1993年12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英汉金融电子化词汇》(赵海宽主编,1992年11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中国金融业务运作全书》(尚福林、赵海宽主编,1996年10月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证券操作与管理大辞典》(赵海宽、陈晓旭主编,1995年8月改革出版社出版);《金融改革》(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全书》的第十五卷,由赵海宽、尚正明、郝治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百科全书》金融卷(赵效民、赵海宽主编,1993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新金融辞海》(赵海宽为副主编之一),1995年4月改革出版社出版)。我还是《中国金融实务大全》的总编纂人之一。

我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经济、金融类论文三百多篇,其中在日本发表一篇,在香港发表多篇。

我参加过大量的海内外经济、金融学术讨论会。

我还经常应邀去全国各地的一些大专院校、银行机构和其他单位讲课或进行学术报告。1993年不担任所长以后,这种活动增多。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近年来开始减少。

在培养学生方面,我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导师,早期还曾担任过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带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各十多名。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自恢复研究生制度以来,我每年都要参加多家院校经济、金融专业博士生、硕士生(后期主要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的评阅和答辩工作。还参加了一些单位博士后的招收、结业考评工作和优秀论文评审工作。